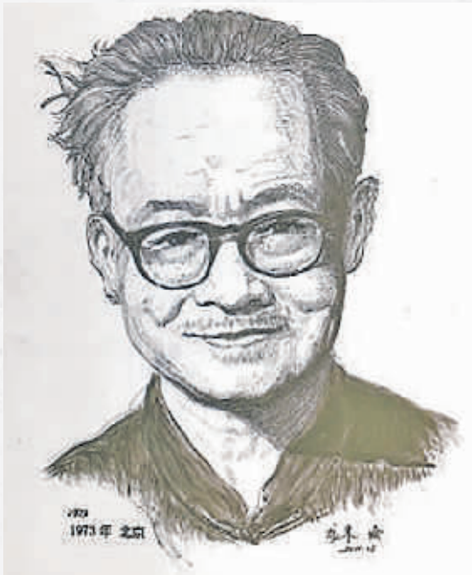
凭窗读史

沈从文与《装饰》

说起沈从文与刊物的关系，有一家杂志与他的关系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于1958年创刊的《装饰》杂志。当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工艺美术综合性学术刊物。也算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合并入清华大学）的学报。编委会成员就有沈从文，还有陈之佛、陈万里、张光宇、张仃、雷圭元等美术界的名家。沈从文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工艺美术的论文，其中不乏后来的名篇《龙凤艺术》《鱼的艺术》《蜀中锦》《谈皮球花》等，可以说，这份杂志成为沈从文物质史研究的一个专业阵地，依靠当时较为丰富的实物，展开系统的研究和写作，从而留下了珍贵的专业论述，也是沈从文写作转型的一个真实见证。



沈从文画像（1973年时）。 龙朱绘

“龙凤艺术”开新篇章

1958年，沈从文56岁，这年6月份沈从文参加文联组织的参观团到北京十三陵工地访问，后被安排到北京市郊八大处休养。在八大处长安寺休养期间，他撰写了《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一文，当年9月份，这篇文章被发表在《装饰》杂志创刊号上，该杂志定义为双月出版的工艺美术类专业刊物，当时所刊发的文章也多由名家撰稿，而且配图极其精美。沈从文应该是受邀成为该刊的编委，但他的工作单位还在历史博物馆。此后他率队辗转各地，如苏州、南京、杭州，带着故宫和历史博物馆藏的明清丝绸、刺绣，前往这些地方进行展览和交流，希望促进江南一带的丝绸纹样革新。

在第二期杂志上，沈从文就发表了《鱼的艺术》，系统论述鱼图案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发展，其中门类涉及陶器、瓷器、绸缎、刺绣、漆器等艺术纹样，乃至于现实中的养鱼观赏。作者在文中提及：“还有北京胡同窄巷间，每天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发现卖金鱼的担子，卖鱼的通常是个年过七十和气亲人的老头子，小孩一见这种担子，必围着不肯走开，卖鱼的老头子和装在玻璃缸里的小金鱼，使得小朋友眼睛发光。三者又常常共同综合形成一幅动人的画稿，至于使它转成艺术，却还有待艺术家的彩笔！”

就在1958年年末，沈从文婉拒接替老舍的北京市文联主席职务：“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不上台面的人。”可知沈从文已经决心从文学创作转到文物研究方面。

次年即1959年1月8日，沈从文在其生日这天，还在故宫为美术学校的一批学生进行绸缎和陶瓷文物讲解，虽然觉得有些疲累，但觉得内心充实。他接连在《装饰》上发表了《谈挑花》（第3期）、《介绍几片清代花锦》（第4期）。

在3月12日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提到自己很忙，“为新建的历史博物馆陈列提供参考材料，参加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历史图谱编辑工作。”在3月16日的给大哥的信中详细提及他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想法，“绸缎研究，千百年来没有人注过意。”这几年他作为保管员，机会好，摸了几万种实物，自己又有综合文物的基础，因此对于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过去没人敢接手的门类，自己渐渐摸索到了门路，“且因此发现了许多问题，为工艺花纹发展史打下了个好基础。又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也是个新问题，再深入一步，将为这部门鉴定工作建立些新观念。”

由此可知，沈从文对于文物研究逐渐上心，并且有意继续开拓下去，甚至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也做了有关文物研究的书面发言，并有具体的书面提案呈交。

古为今用的现实研究

1959年4月，沈从文作为政协委员出席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交出了自己的一份提案希望改进文物工作，加强各方面协作，希望现有文物，如古代精美工艺品，如何为现在的工艺和生产服务，希望各收藏单位能够打破壁垒，推动美育教育普及。他提出，多办一些展览，尤其是在大学和江南丝绸生产地区，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又如在浙江丝绸区作进修展览，在上海作有关工艺品花纹图案综合性展览。

在提案中，沈从文提出拍摄美术教育电影片，帮助学校对美术师生进行美育行动，并与出版部门合作，印行美术图案，供各种毛、棉、麻、丝等纺织物以及日用轻工业品的使用花样。总而言之，即古为今用，各地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新出土的文物，都应该及时为当下的设计、生产所借鉴引用，这既是一种民族自信，也是一种对固有的文物研究工作的创新路径。

同年5月，沈从文的《谈皮球花》在《装饰》第5期发表，这篇文章不但配有大篇幅的精美彩印图片，而且还有沈从文以章草书写了标题，可谓是相得益彰。很多含有皮球花图案的图片也都是来自于故宫收藏以及新收集的瓷器、丝织类文物。同样，《蜀中锦》这篇论文，在《装饰》第6期发表也是如此操作，可以说这本杂志对于沈从文发表工艺品论文非常得心应手。

这年6月，沈从文对于即将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大有期待，并希望在十月份国庆后，自己能有个像样的研究室，有两万册书，二十万个图片，三五个得力助手。他觉得用个三五年扎扎实实工作，可以解决文献和实物隔阂的问题，“特别是丝绸服装史和工艺美术史、家具发展史……”可见他在此时就开始着手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并在致信给大哥时也提到，准备弄一个《服装史》供全国使用。

这一年，沈从文获得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重用，兼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顾问，为筹备织绣馆写作陈列设计。在获得年终奖金时，沈从文却致信馆长，要求把奖金退回去，因为他觉得自己虽工作十年，但只是不犯错误，并不算工作突出。希望公家少一笔这个开支，或者捐献给公家，补贴给其他需要经济补助的同志。

“跛者不忘履”致力中国工艺美术

《装饰》杂志为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报，该学院创办人之一为庞薰琹。早在抗战时期，庞薰琹南下昆明，就曾经入住过沈家，并与沈家长子沈云麓成为好友。后来庞薰琹住在云南呈贡青云街，受陈梦家、沈从文的鼓励，开始研究古代装饰纹样，绘著《中国图案集》四册。他在回忆录写道：“搬进青云街，……陈梦家每次来看我，总要借几本书给我看，我立刻被古代装饰纹样所吸引了。我一面看书，一面临摹纹样，同时我又开始画《中国图案集》，沈从文也极力鼓励我研究装饰纹样。《中国图案集》共画了四册，每册二十五页，共一百页。”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在为《装饰》供稿时，还与《装饰》编委会成员张光宇、雷圭元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锦缎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合作者的名人中也有庞薰琹。不知从文进入《装饰》杂志成为编委，并成为专栏作者，是否也与庞薰琹有关。

1960年，沈从文撰写的《花边》一文刊登在《装饰》第11期。这一期是“江苏工艺专辑”，其中内容多为与江苏，乃至苏州相关的工艺如刺绣、木雕、苏扇、宋锦、红木家具等，沈从文撰写的《花边》则为古代女性制作服饰的工艺手法，一如既往的是书法题写标题，而且配图精雅。

1960年，沈从文已经陆续完成了《明锦》、《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等图册的编辑出版，并且还协助其他门类的图册出版。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提及，他想去国外看看各地收藏的东方文物，从而与国内所藏进行比较性研究，可是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很不现实，并谈及郑振铎活着（郑振铎于1958年10月空难逝世）的时候还可以与之谈一谈，现在更是没有熟人可以谈及了。

这一年，国家成立高等艺术院校统一教材编写组，沈从文受邀担任顾问，负责对工艺美术、陶瓷、织染纹样等史实进行编写，根据当时参与工作的黄能馥、詹蕙娟回忆内容，沈从文不但不“服从”安排住香山饭店，而且还坚持在简陋的东堂子胡同夜以继日地认真赶写，而后来出版的另一本《中国工艺美术史》也有他为之增补的三分之一内容。

而沈从文为之心醉其中的项目《中国服饰资料》也在这一年完成初步计划，准备用六七百种图画，编成十本书，该项目当年就通过了文化部的审批，并且配备三人协助绘制图像。但是直到1963年才获得历史博物馆的正式立项。但是沈从文一直没有停止这项工作，直到因为1966年的运动才被迫中止。

再说到《装饰》的历程，该刊物创刊于1958年，但是到了1961年5月，《装饰》杂志出版了“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期刊物，之后停刊。1980年，《装饰》复刊，出版了1980年第1期杂志，以张仃院长的著名壁画形象《哪吒闹海》作为封面。主编则为早期担任过编委的吴劳，艺术指导是著名漫画家丁聪。

现在该刊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办的工艺美术综合性学术刊物。由此使人想到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批珍贵文物，则来自于沈从文的捐赠。

根据工艺美术家黄能馥回忆，沈从文先生自1956年起就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授课。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昔日的文物也进入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根据该馆公布的情况，沈从文一共捐赠品为18件（套），其中有瓷器、织绣、唐卡等。

当时沈从文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有一种信念，即“中国人应穿中国衣”。而他在实际研究期间，还希望文物要为大众生活所使用，如教学、生产设计、影视剧演出，如在《装饰》停刊前，他还受邀为京城演出话剧《虎符》特别讲解古代服饰制度和生活习俗，并为之提供了大量的形象和图片资料。因为他一直坚持一个念头，文物研究要相互联系，“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

王道

《装饰》封面。

次第春风到草庐

——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校的日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艺术大师丰子恺一家人与故乡作别，辗转抵达长沙。后来，他又带着女儿去往武汉。在武汉，丰子恺目睹了中国人民守土抗战的坚定决心与意志，这极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1938年4月29日，中国空军迎头痛击日寇的战机，取得了自抗战以来最辉煌的战果。丰子恺闻听捷报，兴奋异常，填了一首《望江南》：“闻警报，逃到酒楼中。击落敌机三十架，花雕美酒饮千盅，谈话有威风。”某日，他又在武汉乡下看到一棵遭人砍伐、只剩主干的大树，春风和煦，那光秃秃的枝干在抽枝发芽——这不正是中国的现状吗？回到寓所后，他赶忙把这个场面画出来，并题写：“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他坚信抗战必胜，中国必胜。在长沙、武汉避居的那些日子里，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漫画，以此表达他的思想和观点。

武汉并非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日寇随即将其确定为重点进攻的目标。在九江失守后，武汉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当局开始疏散人员。情急之下，丰子恺决定接受桂林教育局的邀请，奔赴大后方桂林，为“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的学员讲课。

1938年6月23日一早，丰子恺和家人从长沙出发，次日下午到达桂林，暂居大中华旅馆。桂林“开明书店”的经理陆联棠是丰子恺的朋友，他提前在桂林马皇背租下三间平房，还添置了一些家具，所以丰子恺只在大中华旅馆住了几天，就搬到马皇背的寓所了。

丰子恺作品《劫后重生》。

丰子恺作品《仓皇》。

“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的课程结束后，丰子恺应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唐现之的邀请，到桂林师范学校任教。

桂林师范学校坐落在桂林两江的枫桥，“枫桥”这个称谓是学校建成后才传开的。桂林师范学校的南边有一条洛清江，江水清澈见底，两岸杂树如锦；江上有一座石拱桥，因桥边高大的枫树成林，学校的师生经常在枫林下休息，久而久之，这里便有了“枫桥”之称。由此，桂林师范学校也派生出一个诗意的简称——“枫桥师范”。

唐现之是广西著名的教育家，他筹建桂林师范学校之时，恰逢丰子恺在桂林的“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讲课。他主动登门拜访，邀请丰子恺到桂林师范学校任教，起初丰子恺觉得很为难，毕竟离开讲台十年了，早已习惯自由的创作和生活，但唐现之的真心实意令人动容，丰子恺遂应下此事，到桂林师范学校教授国文和美术。但丰子恺向唐现之提出三个要求：一是不住校。丰子恺深知桂林师范学校还在建造过程中，学校的压力不小，还是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为好；二是有权自主选择国文教材，不照搬课本上的篇目；三是保留在开明书店的编辑职务。对这三个要求，唐现之并无异议，他还找了一间房，作为丰子恺午休的场所；丰子恺也租下泮塘岭村40号谢四嫂家的几间房，那里到桂林师范学校有五六里路。

1938年10月24日，桂林师范学校举行了开学纪念周仪式，由于处在战时，仪式相对简单，丰子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七时十分。行最初次的纪念周。全校师生一百三十余人，教师十余人，雍容一堂，行礼如仪。我脱离教师生活，十年于兹。今日参加此会，犹疑身为来宾，不知自己已是此剧中的一角色了。”

仪式上，唐现之请丰子恺给全校师生讲话，原本他推辞不就，但后来台下的学生一起鼓掌，也就只好上了台。这是丰子恺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同师生讲话，多少有些生疏，所幸他到学校已经有一段时间，并且参加了学校的招生工作，和各位老师日渐熟悉。他结合师范学校的教育宗旨，阐述“礼乐结合”的观点，谈及学生到师范学校读书的三个缘分，当他讲完话，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仪式结束后，丰子恺迅速投入到教学工作中。第一堂课是高师班的美术课，他问学生能否听懂他刚才的讲话，学生纷纷举手表示听得懂，他很高兴。第二堂课是简师班的图画课，讲完课，他又问学生能否听懂他的“石门湾普通话”，结果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表示听不懂，他讲课的兴致受到了些许影响。

尽管存在磕磕绊绊，丰子恺仍对桂林师范学校十分欣赏，对唐现之十分敬重，对其提出的“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的办学理念十分赞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未敢有丝毫的怠慢。不久，唐现之请丰子恺为桂林师范学校写一首校歌，他欣然命笔：“百年之计树人，教育根本在心。桂林师范仁为训，克己复礼泛爱群。洛水之滨，大岭心村。心地耕耘，普雨悉皆荫。”这首校歌充分体现出丰子恺的教育理念，文字优美而典雅，是他创作的众多校歌中的上乘之作。他认为：“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迟早必败。我们将来抗战胜利，重新建国的时候，就好比吾人大病初愈，百体疲乏，需要多量的牛奶来营养调理，方能恢复健康。桂师便是一种牛奶，应该让他好好地保藏起来，留给将来，不要在病中当白开水冲药吃了。”

丰子恺每天在泮塘岭村和学校之间往返，要走十多里的乡间泥路，但他风雨无阻，从没有迟到过。某日桂林下大雪，天气异常寒冷，高师班的学生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等丰子恺来上课。上课铃声响过，只见他准时走进教室，棉袍上都是雪，让学生大为感动。

在国文课上，丰子恺将他写的《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抗战主题的散文发给学生，还给学生讲解了李煜的《相见欢》《清平乐》《浪淘沙》《虞美人》，以激发他们的抗战热情。在教学时他发现学生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不仅乱用标点符号、文法不通，错别字也很多，他就把错用例抄在黑板上，在课上详细讲解、纠正。他要求学生用白话文作文，文章写好以后先念给别人听，只有别人听懂了，才能交卷；标点符号不许乱用，字不许潦草。

除了上课，丰子恺还要参加一些校务会议。一日，因为下午三点需要参加一个会议，丰子恺上完上午的课后并未回家，到同事傅彬然的宿舍休息一会儿。中午无事，他拿起傅彬然的《牡丹亭》翻读起来。突然，门外有人喊“报告”，原来是一个学生要向导师（傅彬然）请假。学生一进门，即向傅彬然鞠躬，鞠躬时头仍垂直看着导师，身体呈弯曲形，好像某种机器的一部分。丰子恺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鞠躬，很好奇，傅彬然告诉他，这是军队里的礼貌，受过军训的学生都这样。等那个学生出了门，丰子恺学起他鞠躬的样子，自觉吃力，继而感叹学生如此鞠躬，着实不易！

下午的会议上，丰子恺是要讲话的，但他一拿起书，就把讲话的事忘了，直到临开会时才想起。他立即针对此次会议的内容打腹稿，将届时需要讲的话梳理一番，不料第一个发言的唐现之就把他想讲的话讲完了。这下，丰子恺“蒙圈”了，只好临时另找话题。类似的情况，在如今的职场上很常见，没承想丰子恺也遇到过。

丰子恺和马一浮在蒋庄。

因为社会动荡，同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的马一浮先生的学生王星贤要离校。王星贤离校前，学校的师生召开茶话会，欢送王先生。

在茶话会上，唐现之请丰子恺讲几句，丰子恺说道：“你们用茶点送先生，我前天作画送先生。画一人正在行路，回视路旁土中有果实嫩芽正在萌动，面有喜色。为什么作此画送别王先生？你们有所不知，原来王先生的老先生——马先生——喜欢吃果子，他家里统统是好的果子。王先生常常去吃。有时老先生送他吃，有时王先生偷来吃。他到两江来的时候，带了许多果子来，他曾把其中一个果子的核抛在这公路旁，就是我们这学校里。将来冬尽春来，一切种子普雨悉皆萌，这种子也萌芽起来。于是王先生再经过我们这地方，眼看见它已发芽，心里很是喜欢。我的画所指的正是这状态……我用这画送别王先生，应把画给你们看，但这画已收藏在王先生的行李中，不便拿出来，只好讲给（你们）听听。这就算补白了。”听完这段幽默风趣的发言，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王星贤刚离校，丰子恺就收到马一浮的来信，马一浮告知丰子恺浙江大学将聘请他为艺术指导，明年桂林师范学校续聘时，不要立即肯定，要留些余地。马一浮还说自己已在宜山购地一亩，建茅屋三间，尚有空地，“正好王星贤和你在此造屋”。浙江大学的邀约很有吸引力，桂林师范学校的师生对丰子恺而言也是难以割舍，所以他在日记中说：“今得马先生信，料浙大相聘之事将成事实，对桂师忽感留恋。不知吾与此百数十质朴广西学生，尚有几许相聚之缘也。”

1939年1月8日，丰子恺收到浙江大学郑晓沧的电报，正式聘请他到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担任讲师和训导。他拟好回电，同意应聘。与此同时，他对桂林师范学校的依依不舍渐浓，说离开这里“半由自愿，半由马先生之吸力。计在此间尚有一月可留。依依之情一起，环境忽增美丽，处处可美”。

1月12日，丰子恺正式向唐现之递交辞呈，唐现之十分大度，只要求他把这个学期的课上完，到二月底再离开；另外，不要让学生知道此事，以免分心。丰子恺自然答应了唐现之的要求，唐现之还非常恭谦地请丰子恺为学校留下宝贵建议。

马上就要离开桂林师范学校了，丰子恺给同事们画了不少漫画，留作纪念，这些画的画题都是元人吕思诚《戏题》中的“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他说：“同事中多颠沛流离而来者，得此画可资振作。”

1939年2月28日下午，桂林师范学校为丰子恺举行欢送会，丰子恺在欢送会上作了深情的演讲，称桂林师范学校为自己的“老家”：“记得吾与诸君初相见时，久雨方晴……今吾与诸君相别，又值天雨方晴，阳光满堂。此足证诸君前途之光明，祈各勉励。”欢送会结束时已经很晚，由校工文嵩提灯引路，唐现之亲自送丰子恺回家，两人在路上有说不尽的话……

从1938年10月24日到1939年2月28日，尽管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校的任教时间十分短暂，但他和学校的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钟桂松